

北洋军阀
统治时期史话

(1895~1928)

陶菊隐·著

武
夫
当
国

海南出版社



(1895~1928)

北洋军阀
统治时期史话

陶菊隐·著

武 夫 当 国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/陶菊隐著. 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5443-1825-7

I. 北… II. 陶… III. 北洋军阀史 IV. K25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7030 号
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

作 者: 陶菊隐

责任编辑: 野 夫

整体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印刷装订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 编: 570216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经销

出版日期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70×970 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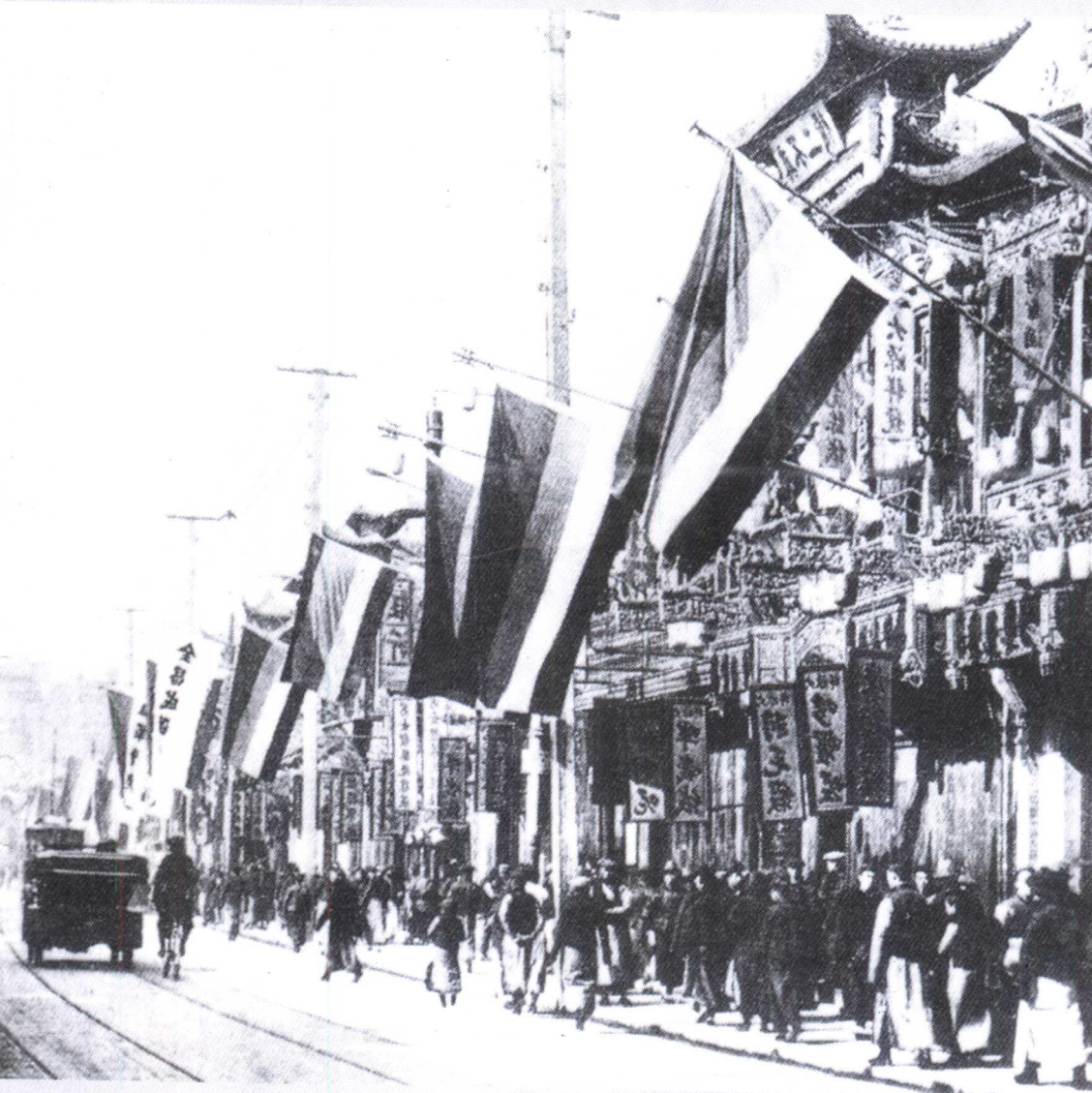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92.25

字 数: 1460 千

书 号: ISBN 7-5443-1825-7/K·156

定 价: 128.00 元 (全五册)

[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]



1911年11月3日，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第24天，上海光复。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风招展，这是一个前途未卜又充满着希望的时刻。



1896 年的孙中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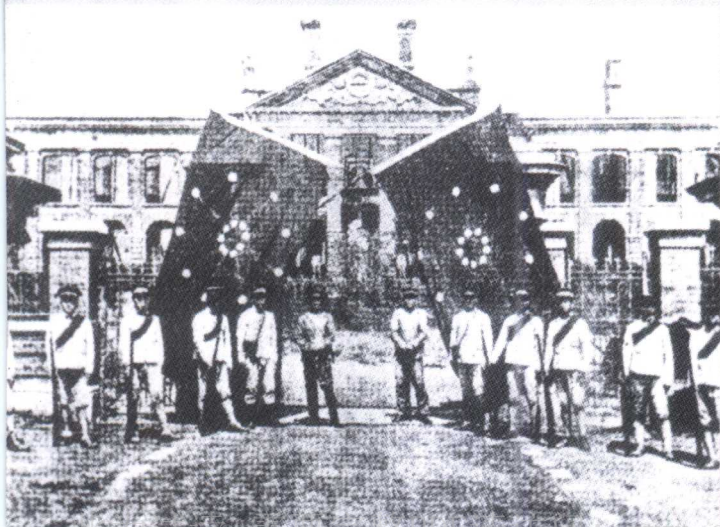
1905 年，日本东京的华兴会成员。



1905 年 9 月，各地立宪派发起国会请愿运动。

1911 年 10 月 11 日，武昌成立中华民国
湖北军政府，悬挂十八星旗。

民国最传奇人物黎元洪。



1912年1月5日，孙中山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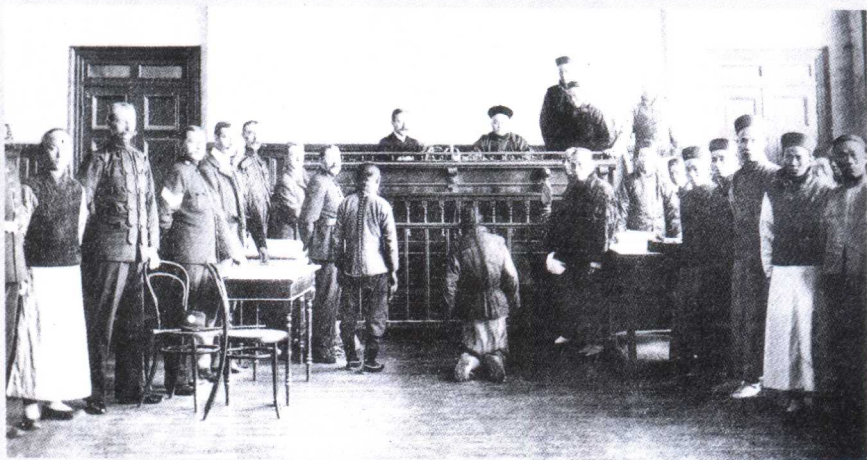
1912年1月28日，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。



1912年9月，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。

1912年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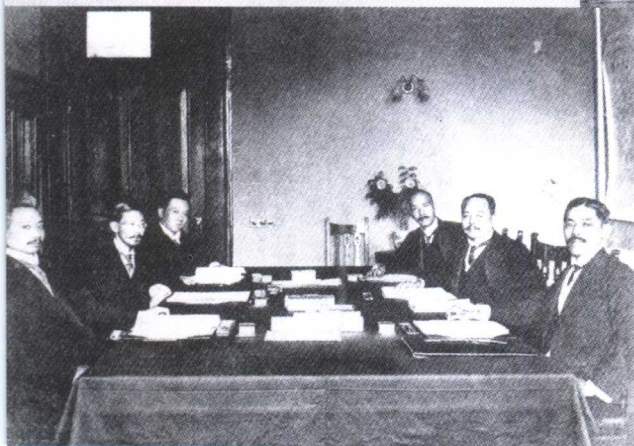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国中之国”，租界里的会审公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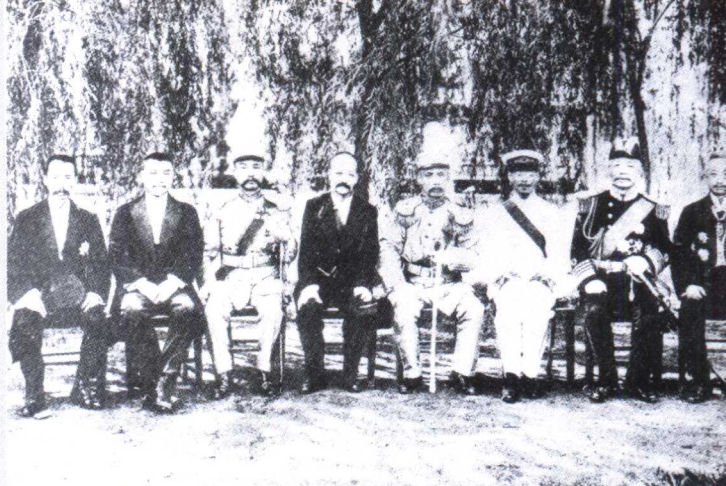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英国巡警。

1915年5月25日，中日代表
签字成立“二十一条”。



1915年年底，帝制活动紧
锣密鼓地进行，并成立登基大
典筹备处，以朱启钤为处长。



袁世凯死后的段内阁，国务总理段祺瑞（右四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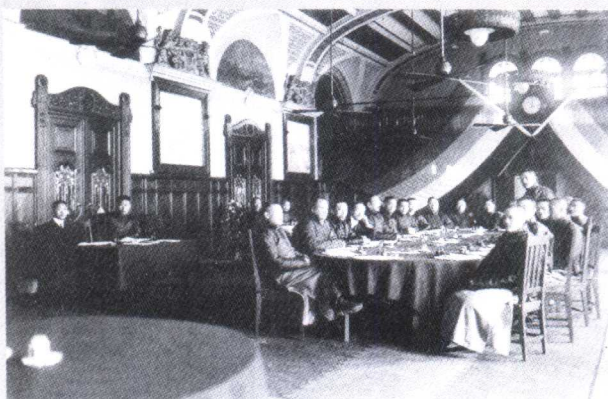


辫子军督帅张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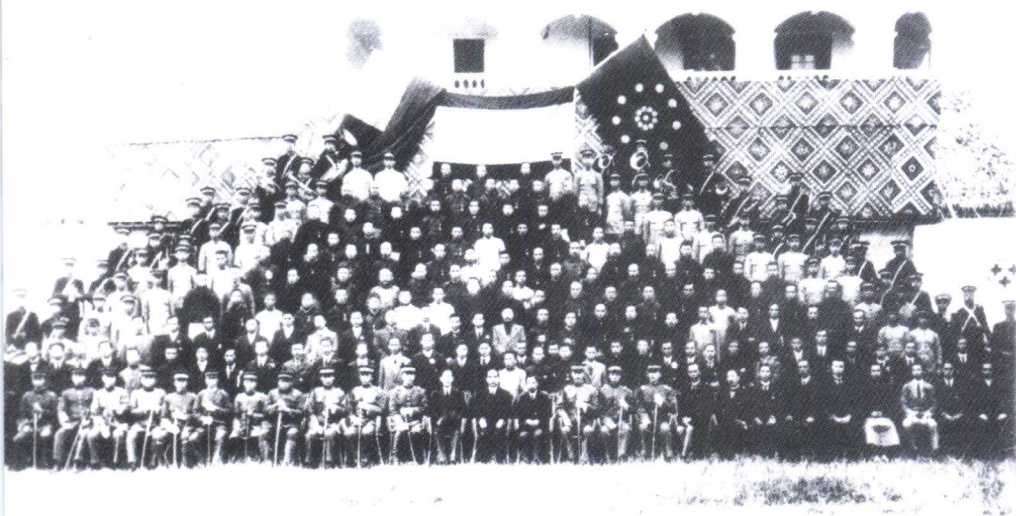
1918年10月，安福国会选出的新总统徐世昌；徐世昌接见各国使节。

1919年2月，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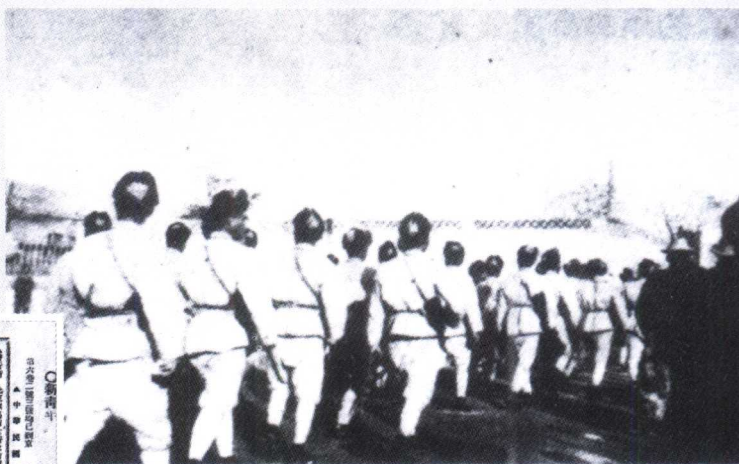


1919年5月9日，国耻日纪念，清华大学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。





1921年5月，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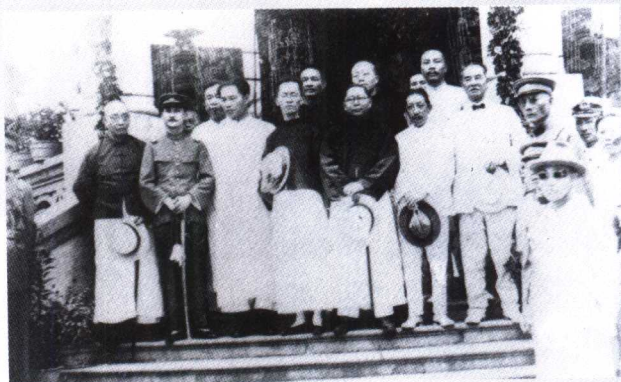


1924年10月，直奉战争前线的冯玉祥回师政变，罢黜并囚禁大总统曹锟。



1918年12月22日，《每周评论》发表“山东问题”的文章。

北伐时期的蒋介石。



1925年7月1日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，汪精卫任主席。

3·18惨案，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。



[illegible]



作者. 1959年. 摄于黄山

陶菊隐 (1898~1989)

湖南长沙人，民国时代的著名记者，近代军阀史的权威见证者和整理研究者。1912年开始进入报界，做过特约通讯员、战地记者、特派记者、编辑、总编辑等，尤以报道北洋军阀最为著名。

本书堪称了解和研究近代军阀的“必修课程”。其他著作还有：《菊隐丛谈（25册）》、《袁世凯演义》、《蒋百里先生传》、《吴佩孚传》、《筹安会六君子传》、《督军团传》、《孤岛见闻》、《记者生活三十年》等。

出版前言

陶菊隐先生是民国时候的大记者，14岁（1912年）进入新闻界，记者生涯正与民国同龄。先生前30余年写新闻，后40余年写旧闻，一生的主要文字都是集中在“北洋军阀”这一段。其人，周旋于武夫政客之间，耳闻目击种种台前与幕后，公讼与私争，堪称一部“北洋军阀”的活词典；其事，从记者到历史作者，完全以自己的亲历和调查而非故纸史料来著述历史，国外有美国的威廉·曼彻斯特（《光荣与梦想》的作者）或可比拟，国内似乎尚无第二。
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，“北洋军阀”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。史家论晚清，常绕不过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一语，而本书所记的这一段，可以说正是这“大变局”的高潮一节，它是帝制的终结和“共和”的开始，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，摸索着向“共和”奔去，其意义重大，其影响深远，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；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，宪法、国会等出现，现代警察制度建立，新式学校普及，新闻舆论形成，等等，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。

另外，这段时间，既是“武夫当国”，也是知识分子最热心国政、积极奔走的时期，诚如吴佩孚讽刺王揖唐的话，“在天下本未有‘斯人不出’之希望，而足下竟有‘舍我其谁’之仔肩”。同时既有前清遗老的余光乍现和当朝新贵的飞扬跋扈，也有后来中国共产党风云人物的初试锋芒。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风云变幻，在这部书里都有很好的体现。

本书名以“史话”，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，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，以140余万字的篇幅，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、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，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。作者行文收发自如，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，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，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，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。虽不假以文学性

的虚构，也已惊心动魄；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，读来却活灵活现，如在今日。

陶先生的这部巨制，之前已经有三联书店的两个版本，分别出版于1959年（全8册）和1983年（全3册）。两次出版，都曾受到很多读者好评，时隔多年，不少热爱者还以收藏有完整的一套为荣。我们这次新版，文字上以1983年的版本为主，兼及参考1959年的版本；并将全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，在标题上作了些简单加工，以使目录更清晰；增加了一些图片资料，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、那个时代的人和重要事件，都有一个更为直接的感受。

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，王学泰先生、张鸣先生、吴思先生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帮助，提供了很好的建议；雷颐先生慨然为本书作序，完颜绍元先生为本书的事情积极奔走，陶端先生提供了很多关于作者的照片和文字资料，在此都一并致谢！

本次新版还增加了一些形势示意图，部分选自武月星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现代史地图集》，谢本书、冯祖貽二位先生主编的《西南军阀史》，特此致谢。

写史不负丹青

雷 颐

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，在《日知录》“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”篇中，有“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，惟太史公能之”之语，足见他对史学中“寓论断于序事”之能力的评价之高。当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对此论格外钦佩，于1961年发表了《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》一文。1980年，时近20年后他又着意将此文重新发表，并发表谈话，提请史学界同仁注意此问题。由此，足见他对此文、此论的重视。或是有感于今天历史叙述于瘪无文，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“讲故事”，往往将丰富多彩、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“公式”，所以白先生在谈话中提出：“今天，我们史学界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，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，能让人爱看，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。一般读者反映，说我们的历史书，写得干巴巴的，人家不爱看。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，改变我们的文风。尽管做起来很困难，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。”

陶菊隐先生近半个世纪前写就的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（以下简称《史话》），便是非常难得的“寓论断于序事”、“能让人爱看”的佳作。

从1912年初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，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“易帜”，这17年里中华大地兵连祸结，战火连天。特别是袁世凯死后，更是出现“有枪便是草头王”的分裂局面，指不胜屈的大小军阀各自为政，彼此征伐，战事一日未绝；军阀、政客纵横捭阖，要尽阴谋诡计。在这17年中，仅“北京政府”即如走马灯般更换了13任总统，46届内阁，而其他“地方”军阀政权的更替则难以胜数。这段历史本身的残忍、荒诞和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，恐超出人们的想像。所以无需任何虚构，仅如实将这段历史作全景性扫描，读来即令人时时紧张、悚惧无任。然而，若无如椽巨笔，休想不假任何虚构即将这一段千头万绪、纷繁复杂的历史说得

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头头是道。而陶先生这 140 余万字的《史话》，却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、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 33 年经纬万端、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。对史实，陶氏极为认真，所用素材皆有所本，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；毫不“戏说”却通俗生动，确当得起“目光如炬的史学家”（曹聚仁语）之称。

然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陶先生其实只有中学学历，并未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。陶先生原籍湖南长沙，出生于 1898 年，中学尚未读完，就于 1912 年进入长沙《女权日报》当编辑，年方 14 即步入新闻界，开始了 30 年的“报人”生涯。不久，就任《湖南民报》编辑，撰写时事述评；稍后辞职接办《湖南新报》，任总编辑。同时，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。1919 年，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，参加湖南的“驱张（敬尧）运动”。由于对湖南政情报道出色，1920 年他受聘为上海《新闻报》驻湘特约通讯员，撰写长沙特约通讯。1927 年任《武汉民报》代理总编辑兼上海《新闻报》驻汉口记者；其间还为著名的《申报》、天津《大公报》撰写通讯。1928 年他曾担任《新闻报》战地记者，随国民军报道“二次北伐”，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，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“济南惨案”。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、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，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，与天津《大公报》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“双杰”。从 30 年代起，他又先后在南京、上海办报。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，他从写“新闻”转为以写北洋时期“旧闻”为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积极宣传抗战，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。长期的政治、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、判断能力，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，曾想将他安排重用，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，便代其婉拒。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时局的看法、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，设法转交。由于他在上海“孤岛”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，坚持抗战，所以几次受到迫害。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上海“孤岛”沦陷，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，过着“隐居”生活，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。1949 年后，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，以他的复杂经历，在“文革”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。“文革”结束，他终获平反，又重新握管疾书，于 1989 年病逝。

陶氏 1912 年步入新闻界时，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、后来史